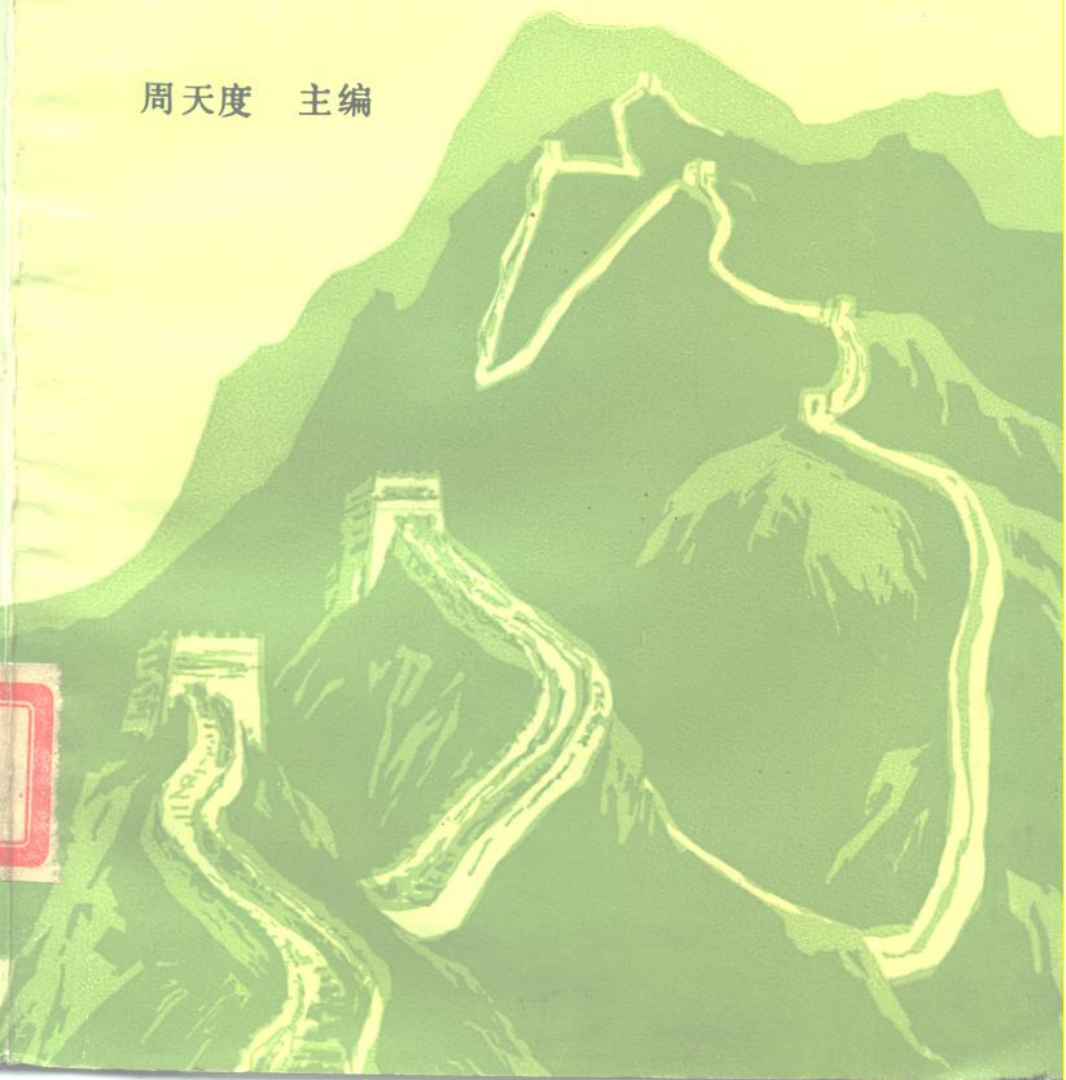


七君子傳

周天度 主編



七君子傳

周天度 主編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宝辉
责任校对：梁 仁
封面设计：李国建
版式设计：王树敏
封面题字：任义明

七君子传

Qi Junzi Zhuan

周天度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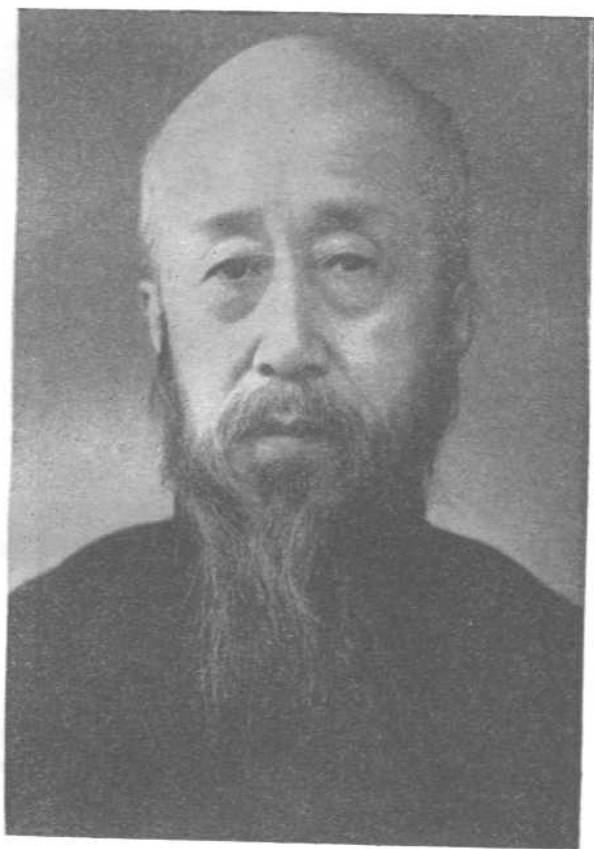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
新华书店 发行
新华书店 经销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3.625印张 8插页 557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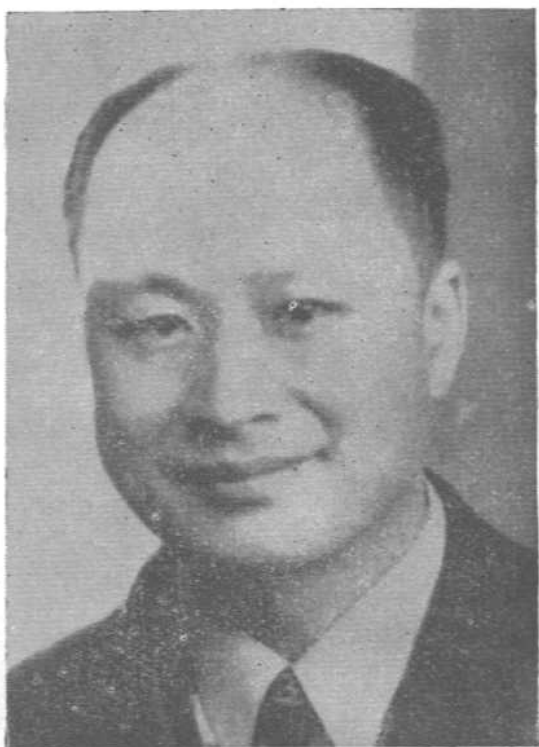
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4900册

ISBN7-5004-0501-4/K·58 定价：9.70元



沈 钧 儒



章 乃 器



邹 韬 奋



李 公 朴



史 良



王 造 时



沙 千 里



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王造时、
沙千里在苏州横街看守所看书学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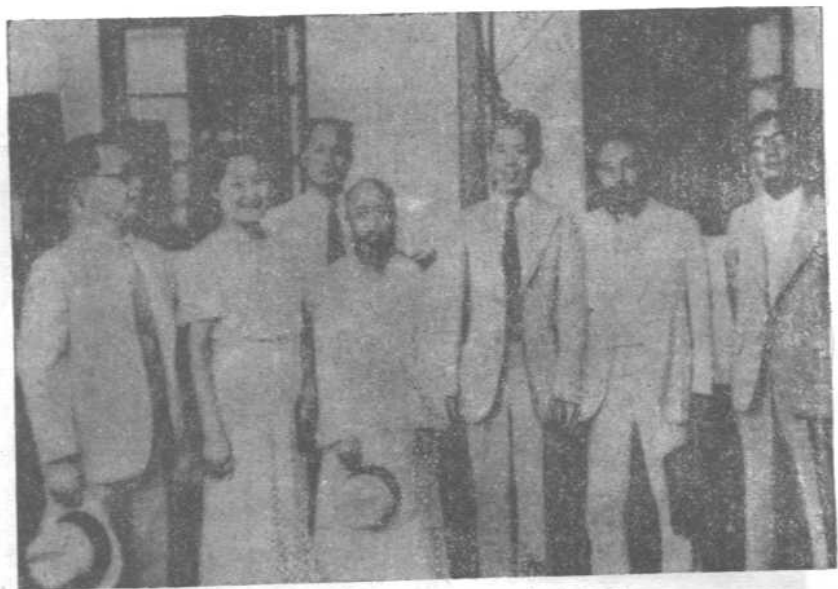
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王造时、

沙千里在苏州横街看守所留影。

史良在苏州司前街女看守所留影。



1937年7月31日“七君子”出狱时，在陈起云的一把119厘米的长扇上题词留念。陈为江南名中医，曾为在苏州狱中的“七君子”治病，他特别敬重“七君子”。



“七君子”出狱时在苏州看守所留影



1937年8月3日，“七君子”出狱后在马相伯家中留影。
后排左一为杜重远。

序 言

1936年11月，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，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史良、王造时、沙千里7人，随后移解苏州羁押，成为当时震惊中外的“七君子”事件。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，就是“七君子”的传记合集。

七、八年前，我曾就救国会的史实进行专题研究，并将所搜集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，连同我所写的一篇关于救国会的长文，编成《救国会》一书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，受到一些包括当年参与领导救国运动的同志的鼓励。但那只是一部资料书，限于时间和篇幅，有些史料未能收入，论文也只是对救国会的一个概述。我深深被“七君子”为抗日救亡而献身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。鲁迅在《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？》一文中说：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第92页）“七君子”正是这样的中华民族的脊梁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决心编写一部“七君子”传，记述他们的经历和主要事迹，剖析他们爱国民主思想的发展过程，找出其中一些共性和共同规律以及不同的个性。我以为，这对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爱国民主运动，特别是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和思想转变过程，是件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。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；不能也不应该忘记为抗

日救国而献身的先辈们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，也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和获得启示。

但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在短时期内所能完成的。因为“七君子”中有5人生活在晚清、民国和新中国3个时代，经历的事情很多。解放以来，除出版过邹韬奋一人的文集，对他的生平有一些研究成果之外，其余6人的有关资料都极为零碎分散，许多问题还不清楚；加上人们对章乃器、王造时和某些与他们有关的历史事件认识评价不尽一致，研究工作有相当大的难度。于是便邀集对“七君子”历史有所了解的何碧辉、方仲伯、宗志文、章立凡等几位同志，合作编写这部传记，互相切磋，由我总成其事，我自己也担负了相当一部分写作任务。其间，我因撰写《蔡元培传》和参与编写《中华民国史》第二编第二卷，几乎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完成这两项任务，只能抽空作点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。近两年来，上述两书已先后付梓问世，其他同志分担撰写的初稿，几经周折，也已写出，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一再督促下，我才全力以赴，投入此书的撰写、修改和定稿工作。现在这一工作总算完成，业已付印，我才如释重负，了却了这桩多年来的心愿。

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仁人志士，总是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以天下为己任。每当国家民族有危难时，他们奋袂而起，为拯救国家民族而献身，甚至毁家纾难，杀身成仁，也都义无反顾，至死不悔。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这些格言古训，正是反映了他们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。“七君子”的经历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，活动的范围，以及思想状况、思维方式，都有所不同，但他们都有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爱国之心。30年代初，自日本侵略者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，沈钧

儒、邹韬奋、王造时、章乃器、史良、李公朴等，都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活动。华北事变后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，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，而当政的国民党继续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对外妥协，对内用兵，对民压迫。在这种局势下，爱国主义的思想纽带将“七君子”紧密地联结在一起，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影响下，他们和他们的战友们，不顾国民党的高压和白色恐怖，挺身而出，发起救国运动，反对国民党错误的内外政策，强烈要求停止内战，团结一致，共御外侮。他们所创建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，是抗战前夕国民党统治区一面抗日救亡的大旗，团结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爱国人士，起到了当时共产党所难以起到的作用，对推进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开展，促使国民党转向抗日，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“七君子”之狱本身，也成为全国反对国民党“爱国有罪”的暴政，争取救国自由，推进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事件。整个八年抗战中，“七君子”在各自的岗位上，为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他们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，令人钦仰。

由于近代中国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压迫，最需要的是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，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，领导这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、救国救民的历史任务，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身上；而中国的社会特点和世界形势，又规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前途，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。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，这句话在今天似乎已成为老生常谈，却是被历史实践所证实了的真理。“七君子”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脉络和行动轨迹表明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。一切真诚的爱国主义者，他们在经过种种艰难曲折和追求探

索之后，最终都会走上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，或者成为共产主义者，或者成为共产党的盟友。伟大的爱国者沈钧儒的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。沈钧儒是清末最后一次科举中式的进士，随后赴日留学，主张君主立宪，回国后参加立宪救国运动。在辛亥革命后长达 20 年的政治生涯中，他参与了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各种活动，但始终未能摆脱改良主义的窠臼，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。后来他从领导抗日救国运动的实践中，亲身体验到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，认识到在国难当头，民族危急存亡之秋，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从民族大义出发，不念旧恶，捐弃前嫌，主张再度同国民党合作，团结全国人民，共同对敌。他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，因此把拯救祖国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。从此，他接受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，摆脱了长期处于彷徨摸索的状态，完成了从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，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过渡。以后，他对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始终坚信不疑，终于成为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，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。他是旧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追求进步、追求真理的一个典型。邹韬奋和沙千里同样具有典型性，他们也是基于强烈的爱国信念，由改良主义者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，最后成为共产主义者的。李公朴在抗战期间访问了延安和其他解放区之后，确信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摇篮，是中国的希望所在，成为共产党的盟友，最后为争取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以身殉。史良从 30 年代初即积极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的工作，直到逝世，在长达 50 余年的历史中，始终和共产党密切合作，是党的忠实盟友。他们 5 人受到党和人民的尊崇信赖，是理所当然的。

章乃器、王造时的情况不尽相同，人们对他们的看法也有所不同，他们最后的遭遇，也因此和其他 5 人迥异。我在此多说几句，也许不是多余的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章乃器和王造时